

社會主義國家的「軟禁文化」

白杰明

讀哈拉茨蒂的《劃地為牢》

繼《正午的黑暗》以後，關於共產主義最令人戰慄的巨著。社會主義國家從集權走向溫和，由文藝工作者領導文藝。藝術家容許作有限度的探索，但卻須主動劃地為牢。要預測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將來，此書可供借鑑。



▲哈拉茨蒂，「軟禁文化」的剖析者。

在一九八五至八六年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瀰漫中國大陸文壇的時候，由胡耀邦、胡啓立和王蒙負責施行的「寬鬆」政策的指導下，官方文藝主管曾吃力地營造了一點具有中國特色的「軟禁文化」。但這種文化形式早已在匈牙利、捷克、波蘭等東歐共產國家存在多年了。

離心份子的著作

「軟禁文化」的特徵，就是讓有既得利益的文藝工作者充當文藝部門的領導，並把朝野藝術家發展成新式的、不必強迫而能「自我審查」的技術官僚。它的精髓是知識階層主動劃地為牢。

「軟禁文化」的形成，發展階段和總體趨勢，早在「一九八一年，匈牙利的著名離心份子哈拉茨蒂（Miklos Haraszti）已作出詳盡介紹。他的專著《劃地為牢：社會主義之下的文藝家》（The Velvet Prison: Artists Under State Socialism）今年十月由紐約Basic Books印行英文版。

此書問世前已經引起了西方知識界的關注。捷克流亡作家 Josef Skvorecky 說：「《劃地為牢》是繼柯斯特勒（Koesler）的《正午的黑暗》以後，關於共產主義最令人戰慄的又一部巨著。」

美國著名評論家桑塔格（Sontag）則說：「哈氏這本精明的作品極為風趣地闡釋了審查和自我審查文化建立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礎上。」漢學家 Simon Leys 應邀為此書英文版封底寫了以下的讀後感：「哈氏的作品再次證明了東歐的離心份子當今世界上最勇敢的探索者——他們正在劃探一個陰森的新世界的地形……」

哈拉茨蒂一九四五年生於耶路撒冷，三年後隨父母到匈牙利定居。他在大學專攻哲學，但也因為善於寫政治歌謠和詩詞而聞名。一九七〇年哈氏與三位友人開始學習漢語，但因為政治原因被開除出學校。隨後他到了一家名為紅星拖拉機廠勞動一年，並寫成了一本震動一時的書，題為《工人國家裏的工人》。《劃地為牢》是哈拉茨蒂一九八一年寫成的，一九八三年在法國出版，直至去年在匈國才非法地出版了原文。

軟硬兼施的文藝政策

哈氏從橫向觀察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總結出一個規律：每個集權國家在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暴力型的槍桿子專制時期後，就要逐漸轉入一個新的、成熟的、溫和的技術官僚階層或文官治國的階段。在這兩者之間的更替過渡時期，國家的領導集體必然要經歷多次反覆才能夠確立新的溫和派統治秩序。

軍人政治在斯大林或毛澤東的領導底下達到了極致。國家機器被用來清算異己，組織鐵一般的社會秩序和新的價值系統。在這個階段，政府採用的手段往往是暴力的和殘酷的。工業和農業經過社會

製造離心份子的領導藝術

在開明的氛圍中，藝術家獲准進行各方面的形式上的探索，並且還可以甄選外國各式各樣的文章技巧，適當地引進以「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

主義改造之後，全歸國有化。同時，知識階層的文化生活也同樣地投到國家懷抱去。個體戶的藝術家終於從無情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市場規律中被「解放」出來了。掙脫了舊社會的羈絆後，他們在國家壟斷文化企業裏面獲取職位。舊時代的為藝術而藝術

價值系統時，不被官方和國家僱用的藝術家口誅筆伐才怪。這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尺度，成了國家體制裏面的蛀蟲和叛徒；他們的存在本身是對新的社會秩序的否定，必須徹底消滅。

主義改造之後，全歸國有化。同時，知識階層的文化生活也同樣地投到國家懷抱去。個體戶的藝術家終於從無情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市場規律中被「解放」出來了。掙脫了舊社會的羈絆後，他們在國家壟斷文化企業裏面獲取職位。舊時代的為藝術而藝術或非政治化的文藝思潮，隨着創作人員大量參加為人民服務型的遵命文藝大行列後，當然就要自行消亡。藝術家就像其他的國家幹部或西方大企業職員一樣，投靠集體出賣靈魂。而恰巧是這些背棄了良心的作家卻被冠以「靈魂的工程師」這個光榮的斯大林主義稱號。

軍事的或嚴峻的統治，往往要維持數十年才能消除社會裏面的敵對力量和舊思想、舊習慣的殘餘成份——包括反對新秩序的人及其意識形態。苛政持續久了，國家可以開始對內實施較緩和的策畧。老的反對派不是人已歸西，就是心已歸順，再也不想折騰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自然先後出現一批「開明派」和「改革家」，像八十年代初的匈牙利和波蘭或者近來的蘇聯和中國，統治者開始推行一套精明的軟硬兼施的政策，社會主義國家進入「後斯大林主義」或「後毛主義」時代。

新的政策，管它叫做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或者叫 glasnost，基本上都是一種高級的計劃式的放任主義策畧。開明的領導人已經看到對社會大致上已不再需要施加壓力和暴力，在不過份強制的統治下，社會仍自行繼續運轉，並未導致對共黨不利的結果。文藝工作者心裏也都明白，為了那些來之不易的待遇，如收入和出版權利、國際上的榮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進入較溫和的技術官僚統治期，他們再也不必痛苦地折服於權貴，因為他們本身已屬於新興的技術官僚階層，多少也成了權貴。

製造離心份子的領導藝術

在開明的氛圍中，藝術家獲准進行各方面的形式上的探索，並且還可以甄選外國各式各樣的文藝技巧，適當地引進以「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但是，正如哈氏所說，西方文藝的外殼雖然可以引進放行，但每個作家和評論家「自己很明白：它的實質內核一定會在海關被扣壓下來。」經過反覆的篩選和鑑定，某些值得「借鑑」的西方技巧可以進口，並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於是國家領導和御用作家們得以異口同聲地說：外國的優良文藝我們都有，但它们的低級、反動的東西統統被我們拒於門外。中國大事清除精神污染或大搞「反資」均屬於這種甄選引進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東歐國均已有的），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當中由於以往的愚昧才出現的失策和偏差，而不是簡單的反攻倒算。

在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總是有個別的文藝家意圖逆歷史潮流而動，嚮往自由創作。哈氏本人就是匈牙利主要的地下民主反對派刊物《Beszelo》的編輯。他對拒絕投身於國營文藝界的藝術家也有獨特的看法：他們試圖恢復自我意識，建立新的價值判斷，並以「出世的思想從事入世的事業」。他們這些努力當然難能可貴，但卻總是失敗。因為技術官僚體系愈成熟，他們被瓦解和統戰的可能性愈大，而他們的作品也難以動搖體制本身。哈氏還認為，開明派統治發展到高級階段時，他們甚至不妨容許一些離心份子存在，充當社會主義制度的點綴。至於那些誤以為國家推行的局部性個體經濟活動實際上標誌了自我意識重現的人，他們的個性文藝（像大陸的一部份朦朧詩人、單幹戶畫家）不可能形成大氣候。到他們企圖另起爐灶，建立自己獨立的價

值體系時，不被官方和國家僱用的藝術家口誅筆伐才怪。這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尺度，成了國家體制裏面的蛀蟲和叛徒；他們的存在本身是對新的社會秩序的否定，必須徹底消滅。

中國「軟禁文化」的難產

不過，在文官的溫和政策仍然沒有站穩腳根的過渡時期，過時的僵化「軍事思想」會不時以粗暴無禮的形式對健康的文化建設橫加干涉。哈氏認為，由槍桿子統治到文官治國的更替時間愈長，對政策連續性的干擾和反覆就會愈多。並且，在每次反覆當中，軍人的無知和粗野會促成一批一批的離心份子出現。以中國大陸為例，自從魏京生等民運人物被肅清以後，中國鮮有知名人士胆敢離經叛道。直至這場「反資」鬥爭，中共老人黨把方勵之等開除出黨，連標準忠誠的黨員劉賓雁亦不能倖免，老自由派吳祖光則被勸退。由此看來，中國大陸在「軟禁文化」方面仍處於「難產」的階段。

雖然中共的元老以「反資」取代了在此之前的「寬鬆」，但哈氏的「預言」將來必然會在中國出現。哈氏的書裏面幾乎每頁都有讓人叫絕的警句。他以冷嘲熱諷的筆調模仿國家文藝幹部的行文，把書寫得像一本黨內密件，給讀者一種「閉門讀禁書」的快感。他給我們解到了在技術官僚掌權後發展集體文藝的整體藍圖和策畧。匈牙利在開放改革的路上起步較早，其「先進經驗」曾多次在中國大陸的「改革派」喉舌，如《世界經濟導報》和《讀書》雜誌上被詳盡地介紹過。故此，要窺視中國大陸文藝界的現狀以及預測它的將來，實不可不讀哈拉茨蒂的《劃地為牢》。看這本書雖然起不到「有備無患」的作用，但卻肯定受益良多。